



婚礼上伴娘伴郎不可或缺 相应的租赁业务大量涌现

租个陌生人做伴娘 靠谱吗

● 近年来,通过出租的方式担任伴娘或伴郎的服务逐渐兴起,不仅一些婚庆公司会提供相关服务,职业伴娘伴郎平台(工作室)也开始涌现,但更多的还是以个人身份在二手交易平台、社交媒体平台上发布广告,“出租自己担任伴娘(伴郎)”

● 出租伴娘伴郎服务,可以理解作为一种雇佣关系,对于由此衍生出的一系列问题,可以通过民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进行解决。新郎新娘聘请他人担任伴娘伴郎时,应约定好服务内容、报酬标准等事项,避免事后发生纠纷

● 出租伴娘伴郎市场乱象主要表现在供需双方无正规渠道平台作为中介,从而形成信息交流混乱、伴娘伴郎素质无保证、需求方资质模糊等问题,该类型服务的规范需要多方主体共同努力

□ 本报见习记者 孙天骄
□ 本报记者 陈磊

“我的伴娘是花300元租来的。”25岁的蒙蒙在今年2月举行了一场盛大的婚礼:帅气的新郎,体贴的伴娘,顺利的婚礼流程……婚礼当天,一切细节都令她感到满意。而在婚礼前期准备时,伴娘人选问题曾让她十分头疼。

蒙蒙说,她的婚礼计划请两个伴娘,本来已经提前半年和自己的两个朋友商量好了,结果临近婚期,两位朋友却都因各自的原因而无法参加,身边其他亲戚朋友里也没有合适的女生可以担任伴娘。正在焦急之际,婚纱店的店员告诉蒙蒙可以提供租赁伴娘服务。很快,蒙蒙就敲定了两个职业伴娘,每人300元一天。

《法治日报》记者调查发现,近年来,像这样通过出租的方式担任伴娘或伴郎的服务逐渐兴起,不仅一些婚庆公司已经开始提供相关服务,职业伴娘伴郎平台(工作室)也开始涌现,但更多的还是以个人身份在二手交易平台、社交媒体平台上发布广告,“出租自己担任伴娘(伴郎)”。

值得注意的是,从调查采访情况来看,目前针对出租伴娘伴郎服务的争议较大,且这一新兴市场的渐趋火热背后存在不少乱象,如价格差异大,缺乏标准和准入门槛等。

接受采访的专家认为,出租伴娘伴郎服务,实际上是供需双方进行的一场服务交易,可以理解作为一种雇佣关系。对于由这种雇佣关系衍生出的一系列问题,可以通过民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进行解决,同时,针对资质不足等问题,建议互联网平台、婚庆公司等中介平台以及交易双方重视规范审查,避免后续出现纠纷。

符合市场现实需求 租赁伴娘交易暴增

在婚礼开始之前,蒙蒙对于租赁伴娘还是有所顾虑,反复犹豫到底要不要租伴娘,毕竟在人生最幸福的时刻,由陌生人在旁陪伴,“显得自己很可怜”,同时也担心安全问题。最终,在得到婚纱店安全保障承诺并反复要求对方对职业伴娘的身份保密的前提下,她才确定租了两个伴娘。

婚礼当天,两个家住当地的伴娘早上5点多就赶到蒙蒙所住的酒店,开始计划堵门游戏等环节的流程。中午的婚礼仪式上,其中一位伴娘还以蒙蒙闺蜜的身份,捧花致辞为她送上了祝福。当天下午2点,婚礼宴席散场,两位伴娘圆满完成了任务。

婚礼结束后,蒙蒙专门准备了伴手礼送给两位伴娘。她对这两个租来的伴娘赞不绝口:“虽然之前素不相识,但这两个小姑娘不仅在婚礼当天助推婚礼流程顺利进行,而且性格活泼又细心,不停地帮忙扶婚纱、穿鞋、做造型,甚至接亲游戏环节的红包最后也都原封不动地退了回来,让我觉得特别感动。”

此外,蒙蒙还算了一笔细账:如果原定的两个朋友来当伴娘,往返路费、酒店住宿费等都是必要开销。相比之下,租伴娘至少省了2000元。

事实上,近年来像这样选择伴娘或者伴郎的情况越来越多,相应的出租伴娘或伴郎服务也越来越多。记者在某二手交易平台上以“出租伴娘”为关键词进行检索后发现,以“出租自己当伴娘”内容发帖的不计其数,价格在200元至800元不等。在文案中,出租者通常会说明自己的身高、体重、年龄等个

人信息。
根据该
二手交易平台
统计数据,2021年
的5月1日至5日,平台

上“出租伴娘”的交易量达去年同期20倍以上,服务价格从数百元到上千元不等。而“出租伴郎”的服务在平台上也有供应,但成交量只有伴娘的25%。

华东政法大学经济法学院教授任超说,新人不愿欠人情债,婚期将近而身边找不到合适的伴娘伴郎,希望有经验的伴娘伴郎可以保障婚礼顺利进行等情形的出现,使得出租伴娘伴郎有了现实需求。本质上而言,出租伴娘伴郎服务的服务模式,可以理解作为一种雇佣合同。

北京理工大学法学院教授孟强同样认为,出租伴娘伴郎为新人提供协助举办婚礼的服务,具有提供劳务的性质,符合市场需求,应当允许其存在。

职业伴娘伴郎出现 协助完成婚礼流程

目前在四川成都读书的大四女生谢宇科,是一名“00后”。去年1月,她在刷手机时偶然看到了一条关于出租伴娘的广告,于是也抱着试一试的态度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出租自己担任伴娘的广告。

第一次担任出租伴娘,谢宇科收获了2600元报酬。不菲的收入加上好吃的婚宴,让本就热爱旅游的谢宇科乐在其中。如今,她已经通过出租的方式担任伴娘超过40次,足迹遍布全国各地。

谢宇科说,对于租赁伴娘的新娘来说,都希望伴娘有较丰富的经验,有足够的控场能力,而“身份保密”几乎是一个必备要求。这种情况下,她会与新娘提前约定需要“伪装”的身份,通常是扮成新娘的闺蜜、同学,有时还需在仪式阶段负责搀手捧花、为新人致辞以及献唱等才艺表演。

她介绍说,担任伴娘的流程通常大同小异,需要在婚礼当天随时陪伴在新娘左右,负责接亲游戏的策划,在婚礼上为新娘整理着装,倒酒水,拿杯子,端托盘,递戒指,并应对可能的突发情况。“伴娘最大的职责就是确保一切顺利,既活跃气氛,也不会耽误‘吉时’。”

最令她难忘的一次经历,是一场在河南洛阳举办的婚礼。婚礼前一晚,谢宇科作为新娘唯一的伴娘,和新娘住在同一间房,两人聊天过程中,新娘突然说:“这个婚我不想结了。”

谢宇科惊了,追问之下得知新娘和新郎是相亲认识的,平时一个月才能见两三面,不到一年时间就谈婚论嫁。两人之间缺乏沟通和安全感,而婚礼前夕的紧张感放大了这种焦虑。谢宇科先是安慰了新娘的情绪,然

后为她出谋划策:“我帮她分析其实就是两个人之间缺乏沟通,她需要的是新郎更多的关心,让她有安全感。于是,我帮她想了一些沟通的话,让她给新郎打了一通电话,把话说开把心结打开。”最终,在新郎新娘敞开心扉地沟通下,这一桩意外被化解,谢宇科笑言感觉自己“拯救了一场婚礼”。

从兼职做出租伴娘,到成为职业伴娘伴郎公司的负责人,谢宇科只用了一年多的时间。今年2月,她在浙江注册了一家公司,主营伴娘伴郎租赁服务。据她介绍,目前该公司已经吸纳了2.5万余人,绝大部分是兼职做出租伴娘伴郎的。

她告诉记者,她所创建的平台现在一个月接单量在五六百单左右,一般每单在500元以上。事实上,除出租伴娘之外,出租伴郎也有一定的市场需求,但数量差距较大,目前市场上伴娘伴郎的比例大概在9:1。

22岁的尹元辑今年3月成为该公司的一名职业伴郎,截至目前仅参加过两场婚礼。他对自己以职业伴郎身份参加的第一场婚礼印象深刻。新郎新娘在海南海口包下了一个五星级酒店,6个伴郎和6个伴娘全是租来的。

尹元辑说,伴郎和伴娘相比,对体力的要求可能会更高一些,主要需要布置婚车、婚房,在接亲的时候完成撞门仪式,配合伴娘安排的游戏。尹元辑等职业伴娘伴郎从彩排到仪式结束忙碌了整整两天,从迎宾到敬酒,每个婚礼细节都需要他们提前为新郎考虑到。

“当职业伴郎,尤其是参加过这么豪华的婚礼后,我最大的感受就是,如果将来我结婚,最好还是一切从简吧。”尹元辑笑着说。

规范缺失野蛮生长 亟须完善服务标准

“目前来看,出租伴娘伴郎准入门槛低,似乎谁都能做,各个社交媒体平台上,搜索相关关键词,能看到大量由个人发布的出租自己的信息。”谢宇科说,一些婚庆公司尽管也会提供出租伴娘伴郎服务,但都是私下临时招募的,并不专业,偶尔会有一些打着“专业伴娘伴郎团”旗号的账号,其背后只是一个临时的小团体或者工作室,没有在有关部门注册和登记,缺乏营业资质,“根本不靠谱”。

据谢宇科透露,由于当前出租伴娘伴郎多为个人或临时工作室,缺乏约束,担任伴娘伴郎的效果如何全靠个人责任感,因此可能会有各种状况发生。例如,个人或工作室为迎合新人对伴娘伴郎的需求,虚假填报个人信息;伴娘不够专业,态度敷衍,影响婚礼

体验;在婚礼现场临时加钱等。同时,不仅是出租伴娘伴郎方可能出现问题,因缺乏规范,有需求的新人一方同样可能有临时毁约、故意提出虚假毁约,拒绝支付报酬等问题。

不仅如此,她还关注到,目前对于职业伴娘伴郎没有一个严格的标准和培训系统,价格也是千差万别,仅她自身经历而言,参加婚礼的报酬就有400元到3000元不等。任超认为,租赁伴娘伴郎市场混乱主要表现在供需双方无正规渠道平台作为中

介,从而形成信息交流混乱、伴娘伴郎素质无保证、需求方资质模糊等问题。一些二手交易平台、社交媒体平台上发布的租赁伴娘伴郎广告,平台对此没有起到规范监督的作用,无法为发布广告的人员和需求方之间提供较为集中的信息渠道。“也就是说,供求双方出现信息误差,无法准确获知双方需求。”

他还提到,囿于通过网络平台发布广告,形式较为随意,无法保证服务提供方的质量,该类交易多为“锤子买卖,服务提供方的性价比很可能较差。另外,互联网随机“拼单”成交的交易模式下,基于信息不对称,服务提供方无法通过互联网完全知晓需求方的身份,为该类交易埋下隐患。

因为出租伴娘伴郎服务与婚礼息息相关,带有不可避免的情感属性以及合同交易属性。受访专家认为,该类服务的规范需要多方主体共同努力。“婚庆公司或职业伴娘伴郎平台对于参与出租伴娘伴郎服务人员进行联网登记备案,加强对伴娘伴郎的业务培训等。以互联网平台为主进行出租伴娘伴郎业务的个人,可以通过正规平台,实现供求双方信息的匹配,提高效率的同时,中介平台对于双方资质予以保障。”任超说,对于中介平台而言,需要对供求双方进行资质管理,主要包括身份认证等管理,为供求双方提供平台背书。

孟强从提供服务方角度建议,担任出租伴娘伴郎时要注意自身权益的保护。例如,有些地方可能存在“闹伴娘”的陋习,因此可能引起有关性骚扰的纠纷,还有可能要求伴郎挡酒等习俗,这些都可能引起身体伤害或者侵权行为。

孟强认为,新郎新娘聘请他人担任伴娘伴郎时,应约定好服务内容、报酬标准,以及婚礼过程中收取了他人馈赠的礼物红包的归属等事项,避免事后发生纠纷。谢宇科告诉记者,她目前已经在着手开发平台相关小程序和App,想通过自己创立的平台,将自己当伴娘的经验推广出去,让出租伴娘伴郎的培训更加规范化流程化,并且为行业定价设置一定的参考标准,让价格更透明化。“希望能通过我的努力,让职业伴娘伴郎获得更多的社会认可。”

孟强认为,新郎新娘聘请他人担任伴娘伴郎时,应约定好服务内容、报酬标准,以及婚礼过程中收取了他人馈赠的礼物红包的归属等事项,避免事后发生纠纷。谢宇科告诉记者,她目前已经在着手开发平台相关小程序和App,想通过自己创立的平台,将自己当伴娘的经验推广出去,让出租伴娘伴郎的培训更加规范化流程化,并且为行业定价设置一定的参考标准,让价格更透明化。“希望能通过我的努力,让职业伴娘伴郎获得更多的社会认可。”

孟强认为,新郎新娘聘请他人担任伴娘伴郎时,应约定好服务内容、报酬标准,以及婚礼过程中收取了他人馈赠的礼物红包的归属等事项,避免事后发生纠纷。谢宇科告诉记者,她目前已经在着手开发平台相关小程序和App,想通过自己创立的平台,将自己当伴娘的经验推广出去,让出租伴娘伴郎的培训更加规范化流程化,并且为行业定价设置一定的参考标准,让价格更透明化。“希望能通过我的努力,让职业伴娘伴郎获得更多的社会认可。”

孟强认为,新郎新娘聘请他人担任伴娘伴郎时,应约定好服务内容、报酬标准,以及婚礼过程中收取了他人馈赠的礼物红包的归属等事项,避免事后发生纠纷。谢宇科告诉记者,她目前已经在着手开发平台相关小程序和App,想通过自己创立的平台,将自己当伴娘的经验推广出去,让出租伴娘伴郎的培训更加规范化流程化,并且为行业定价设置一定的参考标准,让价格更透明化。“希望能通过我的努力,让职业伴娘伴郎获得更多的社会认可。”

孟强认为,新郎新娘聘请他人担任伴娘伴郎时,应约定好服务内容、报酬标准,以及婚礼过程中收取了他人馈赠的礼物红包的归属等事项,避免事后发生纠纷。谢宇科告诉记者,她目前已经在着手开发平台相关小程序和App,想通过自己创立的平台,将自己当伴娘的经验推广出去,让出租伴娘伴郎的培训更加规范化流程化,并且为行业定价设置一定的参考标准,让价格更透明化。“希望能通过我的努力,让职业伴娘伴郎获得更多的社会认可。”

漫画/李晓军

□ 本报记者 陈东升 王春
□ 本报通讯员 白坤先

全国首例违法使用消耗臭氧层物质(ODS)构成污染环境犯罪案,“双减”政策下浙江省知产保护第一案,横跨苏浙皖三省特大污染环境案……2021年以来,一批影响有力、示范性强的典型案例从浙江湖州走向全国,引起社会广泛关注,而这背后是湖州法院对案件质量和效率的精准把控,对群众司法获得感的不懈追求。

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杜前近日接受《法治日报》记者采访时介绍,近年来,湖州法院以打造最美新时代法院为发展定位,以“办案最公,用时最少,老百姓获得感最强”为工作目标,系统优化审判流程,数字赋能审判管理,在细节上做文章,在改革上求突破,探索出了一条质效跃升的特色路径。

主动强化系统观念 齐抓共管提升质效

数据指标是审判质效最直观的表现。自动履行率、诉前纠纷化解率、程序比、有财产可供执行案件法定期限内实际执结率等13项重点质效指标中,10项指标居全省前三名——这是2021年湖州法院交出的审判数据高分答卷。

“审判管理就是提质增效的牛鼻子,直接关系办案质效的水平、公平正义的实现、人民群众的司法获得感。但是审判管理又牵一发而动全身,如果仅盯局部数据指标开方施治,那必然会‘按下葫芦浮起瓢’。”杜前说。为此,湖州法院在把握审判权力运行规律的基础上把系统观念摆在突出位置,从大处着眼,全生命周期管控案件质量,一体推进审判质效提升。

2021年4月,湖州中院出台了《关于全面构建案件质量管控体系的实施方案》,聚焦案件全生命周期中影响司法公正、效率,便捷程度的各种因素,提出了26条具体举措,打造全流程、全要素,全覆盖的案件质量管控体系。同时,还有针对性地成立了案件质量管理委员会。

同年9月,湖州法院制定了《关于提升办案效率的十项建议》,抓住“结案率”“同期结案率”“结案均衡度”三个关键性指标,强化行政管理和目标管控,以办案效率的提升,促进案件整体质效优化。

今年2月21日,湖州法院第一时间开展专项行动部署会,就打击虚假诉讼,打击扰乱诉讼秩序行为,打击拒执,清理长期未结案件,“治理”程序空转”等细化部署,进一步撬动案件质量管控能力的提升。

同时,湖州法院还将“一把手”作为抓好审判管理的关键少数,把审判质效纳入党组会“会前必谈”工作,对落后的基层法院院长进行约谈,成立院长庭质效交流群,上下联动,左右互通,齐抓共管提升质效。

提高审执能力水平 实现案结事了和人

“审判工作要注重效率和效果相统一,特别是要对案件进行分类……”今年年初,一场“技专”双全的“三人行”审判经验交流分享会在湖州中院精彩上演。

举办类似的沙龙研讨会,案例演说会,总结审判经验,分享办案心得,在切磋审判技艺中提高审执能力和水平,是湖州法院提升案件质量的一个宝贵经验。

湖州中院副院长潘秩华介绍:“人是提升案件质量的关键所在,对司法权的监督和制约是另一个重要要素。因此,湖州紧盯‘院长庭’和‘员额法官’两类群体,发挥好合议庭、法官会议及审委会等的制约监督作用的同时,严格落实院长监督管理职责,进一步完善员额法官退出和法官惩戒制度,推进完善审判权力制约监督体系,并通过开展‘办案之星’‘比拼’等方式,营造争先创优氛围。”

当前,一场围绕审判核心数据指标,全面推动审判管理由“粗放式”向“精细化”转变的改革正在湖州法院徐徐拉开帷幕。

程序比是一项综合反映“案结事了人和”效果的指标,数值越低,说明案件质量越高,“当事人一件事”经过的办案程序越少,矛盾纠纷“一次性解决”的工作成效越好。

“2021年,湖州法院案件程序比仅为1.4,居浙江省第一,其中一个重要因素便是诉前调解工作的扎实开展。”湖州中院管办主任章丽美说,通过诉前调解,不仅有效避免大量案件进入诉讼程序,大幅度降低程序比,还能使得多方力量参与调解,让矛盾化解在诉前,实质性解决,进一步提升了案件办理质量。

“感谢法院,感谢商会,没想到短短10天时间就把我们公司这起股权转让纠纷化解了。”成功办理股权过户登记后,杭州某科技公司负责人陈某如释重负。

在这起涉及10余起关联纠纷,涉案金额达1.02亿元的跨省股东资格确认案中,湖州中院联合商会力量,仅用时10天,便顺利完成了纠纷调处。

“考虑到本案标的额较大,双方转让股权的意愿也很迫切,事前我们对本案的调解预案做了充分的研讨,事后对调解协议进行了司法确认。”该案承办法官湖州中院民二庭庭长蒋敏说。

2021年,湖州法院通过予调中心诉前委派调解案件16651件,诉前纠纷化解率达63.97%,全省第一。

深化改革智慧赋能 让审判流程加速跑

走进湖州法院数字研判决策中心,穿过“未来之门”,一个环形大屏映入眼帘,上面实时更新着反映全市法院办案质量、办案效率、办案效果以及便捷度的核心指标。

面对数字化改革带来的重大机遇,如何将审判管理与数字深度融合?这是摆在人民法院面前的一个时代课题。为此,湖州法院探索将审判理由“经验决策”向“数助决策”转变,由“阶段性、点状式、碎片化管理”向“全业务、全流程、全生命周期、闭环管控”转变的路径。

去年,湖州中院在浙江省率先成立了数字研判决策中心,依托人工智能、大数据分析等功能,通过一屏展示,智能研判、辅助决策,把“数据流”全面转变成“信息流”“决策流”,动态监测、智能分析核心指标数据,动态掌控全市法院审判质效数据趋势,对超出预设合理区间的指标实现精准决策,为审判团队和法官的高效办案提供辅助。

如果数字研判决策中心是湖州法院的智慧大脑,湖州中院在南海试点成立的集约化数字管理中心,则聚焦了具体的审判执行流程。

该中心将审判辅助事务从审判业务部门剥离,以“集约流水线”配套优化重组审判辅助人力资源,设有评估鉴定组、排期送达组、保全组、调解组、售后组、编排组等团队。

“以往,一个审判辅助人员配合一个法官全流程跟案,现在,各辅助人员负责具体案件中的一个环节并在该特定环节提供‘1对N’定向服务,形成辅助事务‘流水线’流转。”南海区人民法院立案庭副庭长谢鑫芳介绍,通过构建“1+3+N”审判团队,即一名员额法官固定配备一名排期送达员,一名庭内书记员,一名售后人员,最大程度上让法官专注开庭审理,作出判决等审判核心事务,让审判流程加速跑。

在此基础上,集约化数字管理中心又创新性地在入速裁团队,助力破解案件繁简分流这一难题,让简单案件驶上“快车道”。

建立健全长效机制 解决群众急难愁盼

278名审判人员下沉对接180个片区589个村社,46468件纠纷“码”上受理,26586起群众来电高效接听、处理……今年4月1日,在湖州法院“为群众办实事”活动专题视察发布会上,通报了去年八件司法惠民实事的落实情况。

近年来,湖州中院建立了“司法惠民实事”这一载体,把群众反映强烈、反映频次高,社会关注度高,与群众切身利益直接相关的事项作为管理项目,每年在“两会”工作报告中承诺八件司法惠民实事,在立案、审判、执行、信访等各环节把司法为民要求落到实处,在突破一个痛点堵点难点的同时,审判体系和审判能力现代化水平不断提升。

针对群众深恶痛绝的逃避执行,规避执行问题,湖州法院深入推进“执行一件事”改革,拒执打击的力度持续领跑全省。

去年11月,湖州法院在全省试点探索“自诉打击拒执犯罪协作机制”多跨协同子场景应用,从立案移送,协同查证,线上运行三方面破题,细化拆解出不立案及时反馈,人员轨迹查询,银行查控协助等62项最小任务颗粒,规范办理流程,形成打击合力,走出了一条“自诉为主,公诉为辅”的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的诉讼模式。

杜前认为,为群众办实事,关键在“办”,核心在“实”,落脚在“事”,更重要的是要有久久为功的态度,接续奋斗的精神,在常态长效上下功夫。

今年2月,湖州中院在浙江省率先出台《关于建立健全“为群众办实事”长效机制的意见》,建立“为群众办实事”的筛选、落实、评估三大机制,进一步深化管理举措,在共同富裕护航,基层社会治理,营商环境优化、执行攻坚等重点领域持续发力,着力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急难愁盼问题。